

微电影 大情怀 ——微电影《梨园琴心》创作心得

■文/袁雪凝



袁雪凝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20周年,中国电影从横空出世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跟戏曲捆绑在一起。很庆幸作为一名年轻导演,我的处女作《梨园追梦人》和我新拍的《梨园琴心》,都是跟戏曲有关的。

筹备《梨园琴心》之初,我内心充满忐忑。如何将京剧这一古老艺术的精髓,通过现代影像语言传递给观众?如何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梨园故事,在短短几十分钟内焕发新生?创作过程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对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的思考。

《梨园琴心》是微电影《梨园追梦人》的姊妹篇,都是描写当代戏曲人、梨园行故事的写实性故事片。《梨园琴心》首次将镜头聚焦于京胡演奏家这一群体,细腻入微地描写了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点滴——那些酸甜苦辣的日常、悲欢离合的人生轨迹。故事取材于北京的一位年轻京胡名家的亲身经历。该片描述了著名琴师姚远正在为一个重量级的中青年器乐大赛作紧张准备,而在这个紧要关头,他所指导的学生意外受伤,无法完成毕业汇报演出的伴奏任务。一边是苦练数十年终于有机会站到“台中间”,一边是“戏比天大”对观众负责的诺言,姚远经过艰难的内心抉择后,选择坚守一名京剧琴师的初心……

创作之初,编剧、导演、监制等主创团队,就对生活中的京胡琴师本人的从艺经历做了大量且深入的了解,为这部影片的创作打下扎实的内容基础和观众接受基础。京剧演员的故事大家听的见的很多,可与演员息息相关的伴奏器乐演奏者的故事首次“亮相”银幕,他们和演员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亲密无间,相互成就。开机之初是想请一位专业影视演员来饰演剧中“姚远”一角,考虑再三,这一角色非京胡师姚利先生本人莫属。京胡艺术的难度之大,非一日之功,和中国戏曲文化的四功五法一样,需要从小练就,专业的影视演员在“声台形表”上一定更胜一筹,可既会演戏又拉得一手好琴的人屈指可数,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姚利先生在舞台上不仅用精湛的琴艺征服了观众,更以真挚的情感演绎,倾情展现了京胡演奏家在其专业领域内的非凡魅力与深厚底蕴。



影片开头“夜深沉”曲牌演奏的镜头,我用了长达近三分种的推拉摇移以及叠画处理,力求保持完整性。这引发团队内部的争议,有人认为现代观众难以忍受这样的“慢节奏”。但我坚持保留,因为那双手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承载着几十年的功力和匠人对专业驾轻就熟的得意,令我意外的是,试映时年轻观众反而对这些镜头反响最热烈,他们说“仿佛能听到琴弦的呼吸”。这让我明白,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而是我们常常低估了他们的感知力。在表现京剧表演片段时,我没有采用常规的舞台全景拍摄,而是大胆运用了极端特写——青衣眼角的一抹红、圆场跑动时带起的气流、双剑舞动时的韵律。这些碎片化的影像拼凑起来,构成了我对京剧之美的理解: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节的极致追求中。摄影师起初不适应这种拍摄方式,直到看到粗剪素材时才惊叹:“原来京剧可以这样看,可以这样拍,可以这样美。”

影片中还有一场戏,姚远在剧场独自演奏,拉响“夜深沉”那熟悉的旋律时,整个剧组静默无声。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依然“活着”,依然能在不经意间击中现代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后期制作阶段,我们实验性地将京剧曲牌与写实画面进行叠画处理。当第一次播放合成效果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它们可以在某个奇妙的频率上共振。

虽然是一部微电影,但是为了使之影响力更大,知名度更广,传播力更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陶玉玲、张勇手、刘佩琦、何赛飞等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作为配角甚至群众演员倾情加盟,他们的倾情献艺,共同铸就了这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艺术魅力的作品。

作为视听艺术,微电影打动人心的关键在人物,在人物的故事。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下了功夫,根据微电影快节奏的叙事特点作了相应的艺术处理,尝试以小体量承载起传播传统文化的厚重内涵。剧中的人物都是善意的化身,严师慈父的师父杨宝奎(刘佩琦饰),高风亮节的姚远(姚利饰),贤良淑德的白梅(何赛飞饰),善良懂事的徒弟

小郝(嘉央桑珠饰)等,演员、演奏员也都是活生生的人。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事业、家庭、工作、生活,也都是来自于他们各自成长历程的提炼和缩影,比如饰演小崔的演员,是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在校二年级的学生倪婧婧,也会面临毕业的去留问题;生活中的刘佩琦老师,是一位酷爱京剧艺术的资深“票友”,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感情;何赛飞老师本身就是戏曲演员出身的她,饰演起师母白梅这个角色更是驾轻就熟,尤其是当知道自己的化验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内心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段台词的处理,张弛有度,情真意切,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下,镜头叠加,“我爱这个时代”何赛飞重复了三次,层层递进,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含义,随之舞台的大幕缓缓拉上,片尾字幕开始滚动,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大团圆的结局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影习惯,也是中国戏曲延续百年的教化意义。

《梨园琴心》先后在中美电影节等节展上获奖,成片在党建网播映,有年轻观众告诉我,他们因为一部微电影想去现场看京剧,聆听京胡现场的魅力,这简单的反馈让我感到欣慰。这部微电影的创作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最好的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的保存,而是让古老艺术在当代语境中重新找到呼吸的节奏。当京剧的韵律与电影的画面交织,当琴师的不忘初心与年轻人的好奇心对视,传统艺术便在这一刻完成了它的现代转世。这或许就是《梨园琴心》最想表达的心得:传统不是过去时,而是正在进行时。

今天当我回顾《梨园琴心》的创作过程的时候,我从中国戏曲学院走出来,加上我从小生长在戏曲资源非常丰厚的安徽,使得我这次创作基础较为扎实,值得一说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我先后采访了当下京剧界的不计名师,拜望了电影界一些德艺双馨的前辈艺术家,聆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我真心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如此我才能完成这样一次对于我来说难度很大的创作。

(作者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二级导演)

纪念艾明之百年诞辰 今天如何传承“上影一支笔”

■文/钟 茵

“终于为我们编剧开了电影研讨会!”不久前在上海文联举行的“燃烧的生命之火——纪念艾明之百年诞辰电影研讨会”上,上海电影集团一级电影编剧陆寿钧等不少影人感叹。

今年是小说家、剧作家艾明之诞辰100周年,他被称作“上影一支笔”,写出了《护士日记》《少爷的磨难》等一系列经典电影文学剧本。当下如何打造更多反映上海生活、时代特色的海派佳作,艾明之的“一支笔”给影坛、文坛留下诸多启示。

从时代与生活中汲取灵感

艾明之原名黄志堃,1925年出生于上海,1952年夏调至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专业从事写作,不久后,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直至离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作品二十余部(其中拍摄成电影的有十余部),部分作品曾在德、俄、日等国翻译发表。著名电影《护士日记》就是他根据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浮沉》改编而成的。他创作的剧本《幸福》曾被各省市数十个剧团争相排演。“火焰三部曲”第一部《火种》开辟了工业题材的崭新视角,短篇小说《幼芽》《群众丙》《无言歌》等也都受到读者好评。

“老艾,我们都爱你、想念你。”上海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吕晓明和艾明之做过永福路52号的同事,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工业题材电影,艾明之是领军人物和开拓者之一。他的创作经验离不开真实的生活感悟。艾明之曾在上海第三钢铁厂挂职三年,接触工人生活,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都得益于那一段生活的积累。剧作家杨村彬的女儿杨乡也记得,小时候常见父母和艾明之、陈荒煤、李天济等艺术家交流创作,“反复下生活”,是他们共同的心得体会。

“‘上影一支笔’称呼背后,是大家对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的最深厚敬意。”上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认为,艾明之的作品真正从人民出来,紧贴人民生活,在类型和题材上也丰富多样、极具新意。除了生动讲述工人故事的《伟大的起点》《护士日记》,还有讲述青年工人爱情的喜剧《幸福》,反映失足青年问题的《小金鱼》,以音乐为主线的《海上生明月》等。“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时代的创作理念和思想,和对艺术、对电影的热爱与不懈坚持,对今天的电影编剧如何创作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有深远影响和启示。这样的创作精神也是他给后辈留下的一支笔。”

“火焰三部曲”第一部《火种》是艾明之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点,作品气势恢宏,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茅盾曾在《收获》上发表长文评析,并呼吁各方面支持作者完成这一大胆计划。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许朋乐记得,艾明之90多岁时,自己去看望他,发现他最牵挂的还是创作。“我们聊到编剧、电影,他最遗憾的是‘三部曲’的第三部没有写出来。他对社会、人民有满腔的热忱,内心有一团火种,点燃了创作和生命。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作品出来,而且始终踩在时代的脚步上。”

作家管新生还记得,《火种》拿到手后,他一打开就被吸引住了。“作品一开头就很上海、很青春。”在艾明之的启迪下,管新生也在创作中关注工人和工业题材,后来他和女儿、上海淮剧团副团长管燕草一起收集资料、采访老工人,写了100万字长篇小说《百年海上》。“工业题材这些年越来越少人

关注和书写”,管燕草认为,今天缅怀艾明之,也要传承他书写这座城市和工人群体的热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电影编剧李亦中看过三遍《黄浦江的故事》,“艾明之从1908年写到1958年,做到了有戏则长、无戏则无,大手笔推进,把大的党史、现代史节点和五口之家人物故事合在一起,令人佩服。”

“有次我问艾明之的女儿黄小蓓,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说,爸爸一生都紧跟时代步伐,为普通老百姓写电影、写书。她反过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是同样的答案。”陆寿钧认为,这是当下创作中所缺失的。20世纪90年代,八十高龄的艾明之还与陆寿钧、斯民三一起创作了30集电视剧剧本《灯火万家》。“他从二十几岁写电影剧本,一直到八十几岁,还在追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步伐创作。”

王安桅的母亲茹志鹃曾和艾明之合作《春催桃李》,他也曾经多次采访过艾明之,“他就像钻石一样,一颗永流传。”

对编剧给予更高的尊重

此次研讨会活动由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举办。会议由上海影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李骁军主持。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高渊认为,艾明之是大作家,也是大编剧。“我们常发现,有些导演、演员的作品表现会起起伏伏,最根本的还是剧本的好坏。剧本编得不好,影视剧是不可能成功的。应该对编剧本身给予更高的尊重。”

“今天的追怀有一个特别之处,以往比较多地关注导演,今天的主角是编剧。”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介绍,去年以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联合提出“上海电影学派”的概念,丰富中国电影学派的艺术特色。从某种程度上,编剧可能比导演更有海派的烙印,更蕴含上海电影学派的精神。“上海导演的剧本可以来自五湖四海,但上海的编剧要创作的作品,都要立足自己的生活,这也带来很多上海的独特性。”他发现,艾明之的12部电影作品里,除了《青山恋》外,主人公都是知识青年或工人,这鲜明体现了上海都市化的一面。“上海电影学派研究要从导演进一步拓展到编剧,包括演员、电影管理、视听艺术人员等各个层面。”

艾明之对青年非常宽容,是管新生、曹正文等许多上海作家的伯乐。“他从来不开青年人玩笑,总是讲自己做过的傻事,教我们集中精力搞创作。和年轻人一起创作时,他总是把年轻人的名字放在前面,和我一起创作电视剧时也是。他总是看到青年长处,喜欢和青年人交朋友。”陆寿钧说。

艾明之临终前,曾叮嘱前来探望的夏衍电影学会会长、原中影股份总经理、导演江平,“一定要把《少爷的磨难》再拍一次”。前不久,江平已经买下作品版权。他特地向研讨会发来问候,表示将完成艾明之的嘱托。

2017年,黄小蓓将父亲艾明之《火种》等手稿与珍贵历史照片共355件文献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手稿整理研究部副主任刘明辉介绍,在家属许可下,这些手稿文献将最大程度开放给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今年上图东馆将举办电影主题手稿展,其中会展出艾明之的珍贵手稿,让更多人了解他对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

(来源:上观新闻)

《星芽》:湘西烽火中的儿女情与革命魂



本报讯 在湘西这片令人神往而壮丽的土地上,微电影《星芽》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深情讲述了1934年底中国革命洪流中,土家族(毕兹卡人)主居地永顺塔卧的普通百姓在革命斗争中的英勇与奉献。

微电影《新芽》由湘西天雄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该片以微见著,通过生动鲜活故事情节,不仅展现了土家族的民族文化魅力和传统精神,更深刻传达了革命的主题与现实意义。

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永顺县英勇建立革命政权,并在塔卧镇的且列坡村设立了红军医院。这一场景,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湘西地区革命活动的缩影,见证了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土地、改变命运的伟大历程。影片细腻描绘了红军与土家族群众之间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展现了革命火种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燎原之势。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红星布巾包

玉米”情节,是剧情的转折点,也是红色革命希望的象征。奶奶田氏和孙女小英子对红军临别前所赠玉米的珍视,不仅体现了她们对生活的良好期盼,更彰显了她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这包玉米,如同革命的种子,在且列坡村乃至整个湘西地区生根发芽,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将为劳苦大众带来自我解放的曙光和幸福生活的未来。

《星芽》以小故事大叙事的手法,紧紧围绕且列坡村红军医院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展开叙述。影片中,奶奶田氏、孙女小英子和药匠父亲彭正传一家人的行动,生动展现了土家族(毕兹卡)特有的民族性格——坚韧不拔、勇于担当。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红军伤员和全村乡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革命精神的真谛。

通过《星芽》,广大观众得以深入了解湘西地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红二、六军团的活动不仅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更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微电影《星芽》不仅是一部红色革命题材的影片,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民族精神的艺术作品。它通过对湘西地区土家族文化的深刻描绘,传达了希望、团结和勇气的主题。

(高杰)

